

(苏) 尤·邦达列夫著

贾福云 叶 薇译 云 珠校

# 影幕内外



群众出版社

# 影 幕 内 外

〔苏〕尤·邦达列夫 著

贾福云 叶 薇 译

云 珠 校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ИГРА  
ЮРИЙ БОНДАРЕВ

---

本书根据苏联 1985 年《НОВЫЙ МИР》译出

影 幕 内 外  
〔苏〕尤·邦达列夫 著  
贾福云 叶 薇 译

---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昌平达江印刷厂印刷

736 × 965 毫米 32 开 12 印张 206 千字  
1986 年 4 月第 1 版 1986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

---

统一书号：10067.406 定价：2.25 元  
印数：00001 —— 15000 册

## 内 容 提 要

尤·邦达列夫是当今苏联文坛上著名的“战争题材”作家，曾写过《营请求大力支援》、《最后的炮轰》、《热的雪》等中、长篇小说。1975年写的长篇小说《岸》获1977年度苏联国家奖。

1985年邦达列夫发表了这部新作《影幕内外》(小说原名《ИГРА》直译为“演戏”或“游戏”等)。小说在《星火》等杂志连载后，立即在国内引起轰动，各报刊、杂志纷纷发表评论文章。

故事梗概如下：

苏联著名电影导演克雷莫夫为拍摄一部新影片，选中了芭蕾舞演员伊林娜作为影片女主人公的扮演者。这一决定在莫斯科某电影制片厂掀起了轩然大波：有的人对伊林娜的才能表示怀疑；有的人出于嫉妒心理，当面挖苦、讥讽她；更有甚者，写匿名信恐吓她，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她，说她之所以能够扮演主角，因为她是导演的情妇。

年龄尚不满二十岁，没有生活经验的伊林娜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诽谤，陷入了极度的苦闷之中。一天，在外景地，雷雨交加，她跳入河里游泳，结果溺水窒息。由于为她和导演开车的司机古林擅离工作岗位（捞外快去了），使伊林娜没有得到及时抢救而身亡，怒火中烧的克雷莫夫狠揍了司机古林两

拳。

古林为了泄私愤，竟在侦查员调查案件时，诬告克雷莫夫，而司法部门也用诱供等手段，迫使克雷莫夫承认自己对伊林娜之死负有责任。

伊林娜之死构成了克雷莫夫生活中最大的转折点。这位备受尊敬，甚至受崇拜的名导演一下子变成了人们大肆攻击的对象。如果说，同事和朋友们的背弃以及司法部门的纠缠不休，他还能容忍的话，那么，另一种精神摧残和打击则是心地善良的克雷莫夫经不起的。那都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故意将社会上的流言蜚语传给他的妻子和女儿，妻子失去了对他的信任。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克雷莫夫已不愿再回答任何问题。他承认自己是有罪的，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吧。

他独自一人坐上车，开进了森林，沉浸在对往昔的回忆中，他预感到自己即将离开人世，一个声音在问他，“你是谁？”但他连自己的名字也想不起来了。

作家通过一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和一个年轻女演员的遭遇和饮恨而死，尖锐地提出了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

# 第 一 章

---

克雷莫夫坐出租汽车在从机场回家的路上，感到有点不舒服。天气闷热。他的两个太阳穴渗出了汗水，衬衣的硬领紧贴在汗津津的脖子上。他仰靠在后坐上，夏天的热风夹杂着车内散发的汽油味，扑到脸上，他几次摇下玻璃，想凉快凉快。

在这样的时刻，无论在公共汽车站上，还是在商店里，照例挤满了闲散的人们，这使他感到惊异（人们什么时候才工作呢？）。晨光照在树叶上，照在橱窗的玻璃上，闪闪发光。一条条街道，一片片橱窗在眼前旋转而过，人行便道上在红色遮阳伞下放着一排排小桌子，一群群的人们穿着五颜六色的

服装，恰似另一个光源，即便在早晨也使你觉得炽热难忍。这种恰似在梦幻中的到处闪光的纷乱情景，高傲地冲击和贬低了莫斯科街道那朴实无华的格调。每当他从国外归来看到这种情景时，他的情绪便低落下来。然而，更叫他感到不快的是，他以往归来时从未感觉到喉咙里憋得如此难以忍受，好象有什么东西哽塞在那里，憋得他想大哭一场。他不明白自己是怎么了，只想嘲笑和鄙视自己，为什么竟然会产生这种莫名其妙的伤感情绪。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在殷勤好客的巴黎一切都蛮不错。在异国的六天时间里，到处都洋溢着节日的欢乐气氛。他多次参加会见和宴请，而不必为此承担任何义务；他坐在空调设备齐全的影院里看电影，出席各种酒会和讨论会；他观看夜总会的晚场演出，那里有散发着甜蜜芳香气味的半明半暗的深红色灯光，有天鹅绒沙发，还有舞台上女人们苍白的肢体；清晨起来，仔细地刮一番胡子，早餐时喝两杯咖啡提提神，然后审看影片，最后，便是颁发预料之外和意料中的导演荣誉奖。电影节办得成功，而且招待周到。可是，在异国度过的那些愉快和忙乱的日子，给他留下的却只有苦涩的回味和内疚，使他都不愿意回想。

他合上眼睛，竭力想把自己带回到昔日莫斯科的生活轨道上，回到它惯有的节奏上来——重新回到制片厂和艺委会，准备开始下一个拍摄周期。可是，当他想到“我是提前回国的并且将在家中休息

两天”，不知为什么忽然产生了一种令人烦恼的不安。

此刻，汽车已驶到坐落在列宁大街上的住宅门口，拐弯后开进杨树荫底下的院子里，他沿着凉爽的石阶走到已经磨损的电梯室，随后便看到那熟悉的楼道和包着深棕色人造革的前厅大门，门上装着音响电铃。他总是摆脱不了那种一直折磨着他的感情，喉咙里哽咽着泪水，为了使自己定下神来，不得不在走廊里滞留了一会儿。

他按了四下门铃(家用暗号)，仔细听了一会儿，又按了一次，盼望能听到妻子或是女儿和儿子的声音，但是门后静静的，从空荡荡的住宅里传出含混不清的簌簌声。看来，屋里空无一人，

“我的爱妻和可爱的孩子们就是这样用幸福的拥抱来迎接我。”他思忖道，淡然一笑。

他掏出随身带的钥匙，打开房门，把手提箱拖进前厅，前厅里散发着尘土气味。他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那副疲惫不堪的样子，这时，他才突然感觉到，自己总还算走运。是的，他累得要死，只想独自呆在房间里。他默默地、瘫软无力地倒在沙发上，什么都懒得去想。他顺手翻了翻杂志，溜了一眼报纸和在他离家期间送来的文件。

他脱掉上衣，在每间房里转了转，窗户都关得严严实实的，拉着窗帘，屋里闷热。阳光从窗帘缝隙中透了进来，照在地板、地毯和家具上。在没有挂窗帘的厨房里，散发着被晒得发热的漆布味，电

话收费单据从床头小柜上落到地板上，被太阳晒得发黄，卷了起来。显然，全家都到别墅去了。

每当他从国外归来时，总觉得自己在那遥远的地方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那种生活是虚假的，杜撰出来的，消磨生命，而他正是在这种“消磨”中被折腾得精疲力竭。他需要找朋友们叙叙旧，通过聊天使自己从鸡尾酒会、喋喋不休的议论和饭店式的生活中解脱出来——而他在一段时间里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好奇心，曾不得不过那种生活。

现在，他想把自己心灵上的痛苦连同由于强作笑脸和高谈阔论带来的疲劳洗刷掉，把异国香皂的香脂味，把充斥着巴黎电影院和饭店的合成材料的气味，统统洗刷掉。

浴室里的凉水从喷头里象雨丝似地浇在他的身上，水哗哗地流着，带来春意般的凉爽。通向浴室的门开着，水声犹如大海边的回声在空荡荡的住宅里回荡。他用浴巾擦着身子，光着脚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在晒得发热的地板上留下了一个个脚印。他还没有穿好衣服，就站在饭厅里大声喊：“算了，一切都会过去，一切即将过去！”他斟满一杯白兰地酒，一饮而尽，身上感到一阵发热，觉得轻松了一些。

他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浏览着刚从塞得满满的信箱中拿出来的杂志、报纸以及邀请会面和参观展览的各种各样的请柬。他翻看着信件，但并不拆

开，只注意回信地址，期待着出现熟悉的名字。当他将一个浅蓝色的信封慢腾腾地扔在堆满杂志的书桌上，信封上印着的“内务部总局”的陌生公章猛地映入眼帘，立刻引起他的不安。

“就是说，又要开始了……更确切地说，一切在继续？”克雷莫夫迟疑了一会儿，把信封撕开，急速地读了起来。信中说，他，维亚切斯拉夫·安德烈耶维奇·克雷莫夫，必须在7月4日（仅仅三天之后！）持身分证或证明自己身分的其他证件到侦查员托卡列夫处，地址是：彼得罗夫卡大街38号，二楼200室。“为什么还要见第二次？我和他不是制片厂里见过面了吗？是的，就是这个奥列格·葛里戈里耶维奇，一个彬彬有礼、留着整整齐齐的小胡子的聪明的年轻人。可是，可爱的奥列格·葛里戈里耶维奇，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到彼得罗夫卡去的，我不愿意您成为发生的那桩事的影子！”

他在沉思中把传票丢在一旁，接着，开始读一篇关于巴黎电影节影片的评论文章。他感到在刚刚通过的决议中带有某种虚假性，而对于他所导演的那部影片的评价则含有粗暴的歪曲，竟然把“社会主义道德与内心世界极端空虚的西方英雄人物的残暴行为”进行幼稚无知的对比。

“我们的这些评论家都是机灵鬼，只是为什么竟这样无知？”克雷莫夫生气地笑了起来，眼前浮现出美国著名导演的那张肥胖面孔。这个人的父母出生在俄国，他本人是一个很有才华、却又恶毒的人。

他给电影节送上的《索多姆和戈莫拉》影片，使所有的人都感到震惊。影片描写一个疯人院的毁灭，以此象征丧尽天良的人类的死亡。“我的论敌约翰·戈里奇马尔会和我在一起放声大笑。‘纯洁’，‘道德’，‘高度’，我的上帝啊，我们用这些泛滥的词汇来为自己作证，捍卫自己，用它们把自己从头到脚全副武装起来。我们，这些获奖者，赋予自己天使般的洁白无瑕的美德，而毫无顾忌地把一切残忍的东西隐藏在山岗的后面。”

他气愤地开始读另一篇评论文章。在文章中多次重复出现的约翰·戈里奇马尔的影片中那些描写性感、病态和不道德行为的词句。他没有读完，就把报纸丢在一边，大声重复道：

“愚昧，让愚昧见鬼去吧……”

他们两人（两个大国的两名导演）是同时获奖的，同时被邀请出席午宴，每天晚上看过电影之后在饭店的酒吧间里会面。每次会面，两人都用威士忌和伏特加酒互相款待一番，尽管他的酒量赶不上这个美国人。他应约翰·戈里奇马尔的邀请，有两个夜晚是在俱乐部里度过的，每次都要为俄罗斯的命运争论个没完没了，直到不欢而散，因为立场的对立而使他们分离的东西远远超过那些使他们聚集在一起的东西（例如彼此之间的那种贪婪的好奇心）。

在俱乐部的第二夜，由于喝得过量两人争吵得不可开交。次日早上，在看影片之前，他头痛脑胀

地坐在饭店前厅里翻阅放在桌上的一本《巴黎竞赛画报》杂志，他想借故摆脱当天的鸡尾酒会，摆脱那种必须把领带系得紧紧的场面，摆脱戈里奇马尔施放的有害的毒汁，从而使自己有机会喘喘气，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在华灯初上的晚上漫步在巴黎街头。宽敞的前厅不是以巴黎的豪华，而是按照东方的豪华气派装饰起来的。大厅里铺着厚实的地毯，镶着华丽的美国镜子，摆着宽绰的安乐椅和用红色合成皮革包起来的沙发，人们在玻璃大门和门卫室附近走着，压低嗓门交谈，到处都可以闻到雪茄烟味和香水味，——所有这一切对于饭店来说是司空见惯的，克雷莫夫在别的国家也多次看到过。他偶尔抬起头来，目光向那些熟识的和未熟识的制片商和导演们的脸上瞟去，继而转向那些刮得干干净净的或蓄着胡子的人们（当今世界上这两种类型的人同时可以遇到）的脸上，然后目光又停在那些象运动员似的修长身材的影星和不知名的名人以及那些漂亮、年轻或打扮得很年轻的人们的脸上，在他们炯炯有神的目光中尚可看到夜生活的痕迹。但是，好象有某种东西影响着他那习以为常的观察，也许是因为脑袋沉重，也许是镜子的水银光泽反射的缘故。然而，早晨在这宽敞的大厅里他同时看到了饭店聚集在这里的所有人。当他想他们也会发现自己那观察的目光时，顿时浑身冒汗。这时他把注意力又转向《巴黎竞赛画报》，与此同时，他听到了笑声，听到了傲慢的嘲讽，人们在议论他不讲礼貌的好奇，

说他没有权利利用这种好奇的目光打量他们。他顿时觉得脸上象是挨了一巴掌。他抬起头来，看见在制片商和导演圈子里有人用平静的目光凝视着自己，其中有一人身着灰色西装、两鬓斑白，好象曾不只一次地见过面。“那个人我见过，可是他是谁，是谁？”当那人再次在人群中露面时，他从那人的发型、前额、花白头发、领带上渐渐认出来了，他竭力想同那人的目光相遇，但是相距过远。那双眼在暗中死死盯着这边，他忽然出了一身冷汗，生怕心脏会停止跳动。他终于明白了，那个人象是……

毫无疑问，神经过度紧张可能会产生幻觉。他曾经听说过，人有各种各样职业性的反应，但他并没有体验过，竟会是这样！“不可能，愚蠢，胡闹！这是一种幻觉！”于是，他起身把杂志扔在小桌上，拿出战争年代的那股勇气，果断地径直向站在制片商中间的那个人走去。然而那个身穿灰色西装的人不见了……站在那个人位置上的却是法国导演克洛德·莫里哀，一个干瘪的瘦骨嶙嶙的老头。从他那涂染和修剪过的眼睫毛便可看出，这是一个轻佻的人。他以上流社会的那种殷勤劲儿伸出秃顶，向克雷莫夫鞠了一躬，头上稀疏的头发用香水精心梳洗过，还湿乎乎的。不知为什么，克雷莫夫也向他鞠了一躬，殷勤地说了一句：“您好，先生！”随即不自然地直起身子，向大厅尽头的酒吧间走去。在那儿，象往常一样看见戈里奇马尔在柜台那边高兴地向他招呼。戈里奇马尔立即走过来，象得救似地说：“啊，

维亚切斯拉夫，我为你感到高兴！”

第二天在飞机上再没有发生类似的情况。一登上飞机，好似外国的一切，包括那灯红酒绿的场面，连日来的神经紧张和消耗精力的活动，就全部结束了。坐在空着一半坐位的祖国的飞机机舱里，同那些可爱的航空小姐们在一起，一切都变得那样明快和轻松，而且又可以听到俄语了……令人奇怪的是，在这九公里高空的飞机上，竟然发现了两只苍蝇，在舷窗的玻璃上爬来爬去。从舷窗口向外望去，只见一片片浓密的卷云互相凝结在一起，挡住了视线；下面是平坦的云层，令人想起那茫茫无际的北冰洋；透过云海，难以想象它究竟有多厚，再往下看，偶尔隐约地看到被云海淹没的城市、蜘蛛网般的公路和黑压压的森林。

克雷莫夫看一会儿窗外的云海，再看一会儿爬在舷窗上的两只苍蝇，觉得好笑：万里高空、洁白的云朵和不知从何处飞入机舱的两个小小的旅伴，它们之间是多么不相称。两个小东西可能是在谢列明捷耶夫机场或者在奥勒尔机场飞入机舱内的。怎么飞进来的？飞进来干什么？

他思考着这种不相称和随之而来的“为什么”，高兴地看见有一种力量使自己离开飞机，离开它的金属外壳，离开自己一直坐着的机座，飞出去（在空中仍然保持着姿势），看见自己飞翔在沙漠上空，飞翔在风和阳光沐浴下的无边无际的云海上空。

“我知道自己是怎么了，”他自语道，想竭力解

释自己现在的心理状态，“在我的头脑里有个可以实现的理想。我一直盼望能有一种类似单人直升飞机的飞行工具，有时甚至热切地盼望，在一天结束时离开所有的人，飞离地面，毫无目标地翱翔，在童话般的林中草地上降落，夕阳西下，林中一片寂静，倒映的湖水……可是，我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念头呢？我在巴黎饭店的大厅里看见过自己——一只影孤身，穿着考究，也会左右别人的感情，但是那毕竟是在国外，感到很不自在……此刻，我明显地感到空气的压力，胸口憋得难受，又完全摆脱了物质的诱惑，这又怎么解释呢？……

一位身段苗条的航空小姐走了过来，她穿着高跟鞋，走起路来有点微微晃动，手中端着托盘，盘中的几只玻璃杯里盛着冒泡的矿泉水。她满面春风地问他是否喝一杯波尔荣矿泉水。她从阳光明媚的客舱一端向他这边走来（这才象个有风度的漂亮女人），他默不作声，勉强地对她一笑，作为回答。他望着这位外表十分年轻的小姐，听着她那絮絮细语。她说，她知道他从哪儿来，并说看过他拍的影片。

在覆盖大地的无边无际的云海上空飞行使人感到窒息，受熬煎，而脱离云海后的飞行使一切都变得实实在在了。他谢绝了波尔荣矿泉水，要了一杯白兰地，目光重又转向窗外。以前克雷莫夫从未发现自己这种孤僻性格。他闭了一会儿眼睛，他仿佛觉得喷气式发动机的轰鸣声是受害者悲惨的喊叫声和哭泣声，接着又变成了管弦乐和交响乐混杂在一

起的演奏声。克雷莫夫试图捕捉并回忆起某个乐章，但这铿锵的乐曲每秒钟都在变换着，变成难以忍受的号啕哭泣，它象雷鸣电闪，它象震撼宇宙、威胁着全世界的震耳欲聋的轰鸣，而他在蒙胧中继续沉思：“伊丽娜……在她死后，一切都消失了……”

阳光照射在舷窗的玻璃上，一位浅发航空小姐正在分发餐巾。她那娇嫩的双唇上仍然挂着微笑，她又向他问了句什么，他没有听清楚，只是在漫不经心地进餐，对她那机械性的微笑，也报以冷漠的态度。这时，他的脑海里突然钻出一个古怪的念头：此刻，喷气发动机突然失灵，飞机在空中发生了致命的故障，正在从高空往下坠落。这位娇嫩的双唇上涂着口红的航空小姐（永远再不会有人去吻她的嘴唇了），以及整个机舱里的人将会发出多么可怕的尖叫声！……

“我呢？”他思索道，“在那个时刻我会做些什么呢？是等待着最后的打击，同生活诀别吗？我深信自己是不会喊叫的，也不会祈求宽恕……”

他又看到了那两只爬在舷窗玻璃上的苍蝇，厌恶地皱了皱眉头，他仍旧想恢复刚才那被破坏的沉浸在幸福中的心绪——象鸿毛似地在空中飘忽，如同在梦境中，既没有恐惧，也不必承担责任，这是多么怡然自得啊！

“恐惧？我想到了恐惧？”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象是恰巧打在他的太阳穴上，使他 from 瞌睡中惊醒。他快步跳到沙发前，机械

地把手伸向放杂志的小桌子去拿听筒，但立即又把手缩了回来，因为眼下还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已经回到了莫斯科。首先从家里往外打电话，这已成了他的习惯、义务和关心的表示。奥莉加并不知道他提前两天回来，因而不可能是她从别墅打来的电话。

于是他又躺下，重新回到那怡然自得的梦境中。可是电话铃响个不停，他不得不拿起听筒。

“是我，”他平静地说，等待着听到制片主任莫洛奇柯夫那有力的声音。当他听到对方小心翼翼的喘息声时，觉得有点儿蹊跷，便催促道，“喂，是我，请您讲吧，既然拨了号码，那就请您不必客气。”

“是——我呀，”一个小孩拖长声音说着，笑了起来，“你好，爸爸！你回来了？我打电话是碰碰运气，没想到接电话的是你。简直把我吓了一跳。我们在别墅。是妈妈要我从自动电话亭给你打电话的，就在浴场附近。她预感到你就要回来了。我真高兴，爸爸……”

“丹尼卡，我亲爱的孩子！”克雷莫夫激动得声音有些嘶哑，“我很久很久没有看到你，也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我不在，你们过得好吗？妈妈好吗？”

“妈妈吗？可把她吓坏了！”

“你说‘吓坏了’，是什么意思？”

“我想，妈妈，这个世上最漂亮的女人，当你不在时，她烦闷透了。这是秘密。不要说出去。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她每天晚上都坐在你的办公室里，读……啊，多么可怕！”她顽皮地尖叫了一声，